

现代僧中素王——震华法师

□ 陈兵

历史是现实的镜子,鉴古可以明今,观往可以知来。中华民族的祖先,早就深明这一道理,历代皆设有史官,记载时事,编撰历史,既留下人类活动的雪泥鸿爪,又为现实的政治提供借鉴。史官被称为“素王”,足见其作用重要,中国人极其重史的文化传统,自然影响及佛教,自南北朝以来,出现了一类专门致力于教史僧传编写的“史僧”,如梁释慧皎、宝唱,唐释道宣,宋释赞宁、志磐,元释念常、觉岸,明释幻轮等,皆以撰写教史僧传名世,留下了《高僧传》、《比丘尼传》、《续高僧传》、《佛祖统纪》、《佛祖历代通载》、《释氏稽古略》等数十种教史类著作,给后人提供了总结佛教弘传历史经验、景仰古德懿行的宝贵文献。重视教史编撰,成为中国佛教的一大优良传统。

在近现代佛教复兴运动中,中国佛教重史的传统得到发扬,涌现了一些成绩卓著的“史僧”,其中最令人感佩者是震华法师(1909—1947年)。法师俗名唐全心,出生于江苏兴化县贫苦农家,童年失怙,投家乡圆通庵出家,剃度师怀莲志和尚送他入私塾读书,天资颖悟,工诗文,善画兰竹。19岁入镇江超岸寺佛学社,依止宗说兼通的守培法师学习经教。1929年受具戒后入镇江竹林寺佛学院深造,内外兼学,品学兼优,翌年即升任教师,旋任院长,1938年接任竹林寺住持,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努力恢复了业已停办的竹林寺佛学院。1940年应聘任上海玉佛寺住持,五年间,修殿堂,饰佛像,迎请经藏,创办“上海佛学院”,《妙法轮》月刊,成立“弘一大师纪念会”,

业绩昭著,被推举为太虚大师领导的“中国佛学会”上海分会理事长,热心支持太虚大师领导的佛教复兴事业,不顾病弱之躯,为太虚领导的“中国佛教整理委员会”在镇江焦山开办的“僧材训练班”授课,终至积劳成疾,病逝于上海玉佛寺,年仅39岁。

震华是一位学者型高僧,自幼雅好文史,文字工夫颇深,自学僧时代起,他便以从事佛教教育与佛学著述为职志,卒业后以佛教史为主攻方向,搜检查阅,編集撰述,十几年如一日,夜以继日,笔不停挥。前后撰有《僧伽护国史》、《续比丘尼传》、《夹山奕叶集》、《兴华佛教通志》、《东渡弘法高僧传》、《入华求法高僧传》、《清代佛教年鉴》、《泰县佛教志》、《镇江佛教隅志》、《夹山志》、《回龙山志》、《圆通庵志》、《轶事丛考》、《中国佛教人名大辞典》等佛教史志类著作十余种,另有《历代僧制泛论》、《玉山守培老人传》、《福善仁者仁略》等史论、传记多篇,其在佛教史传方面著述之丰,种类之多,涉及面之广,可谓前无古人,不愧为佛教之马迁,僧界之素王。即

在现代中国史学界,震华法师的学术成就,也是不多见的。特别是以一人之力,编撰《中国佛教人名大辞典》之大部头辞书,倾十余年之力,搜集资料,抄写剪贴,校正考覆,其精勤辛劳,足令学人敬佩。此外,震华法师还有《兴化方外诗征》、《佛教纲要》、《比丘尼创作集》、《表彰集》、《碧岩吟稿》、《佛教经济十二门论》等著作,震华法师在短短十几年的工作时间内,在战乱频仍、民不聊生的艰难岁月里,资料、资金短缺的情况下,以一病弱出家儿之力,于住持、教学、课诵之余,贡献出

学界一般专职研究人员集数人之力毕生工作才能拿得出的文字成果,可谓天下奇事一桩。他的天资固非寻常,然而使他能成就如此奇事者,大概全在弘法悲愿的巨大动力激发出的精进不息、勤奋异常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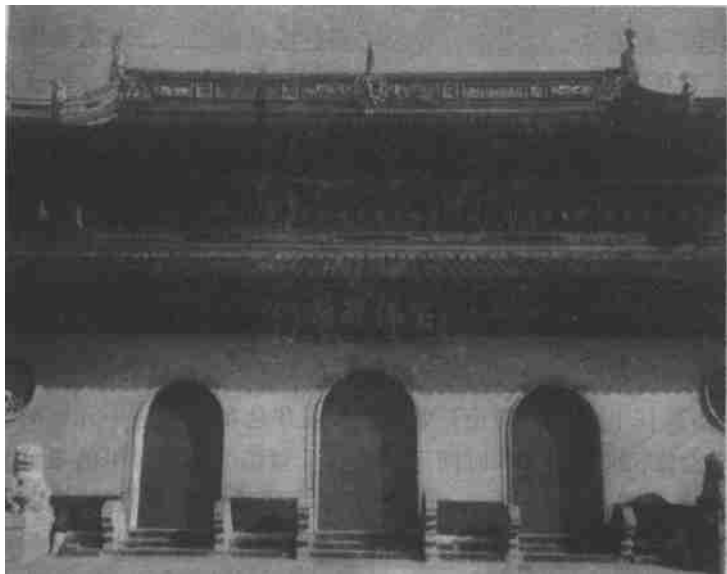
生当佛教转型时代,全身心投入佛教复兴运动的震华法师,并非为治史而治史或为个人爱好而治佛史的书斋式学者僧。他的治佛教史,多紧扣佛教现实,引史鉴今,有着明显的现实目的,融贯着发扬优秀传统文化、改革腐朽、针治时弊、改变社会对佛教误解的佛教复兴思想。他的其它论著,亦多如此。

《续比丘尼传》是震华法师最早着手编写的僧传,此书之作,明显出于回应女权运动潮流、促进男女平等的先进思想,旨在提高尼众地位,振作尼众精神。尼众为僧界之“半边天”,长期以来,受男尊女卑的封建思想影响,尼众在教内外备受压抑,纵有高行懿德,亦多湮没不闻。自梁释宝唱撰《比丘尼传》四卷为东晋迄梁的65位高尼作传后,千余年来无人续作,反映出佛教界受封建思想习气影响而轻视尼众的状况。震华法师当是有所感于此,决心续写比丘尼传,历时八九年完成,凡六卷,按时间顺序,收自梁至民国1400余年间高尼传200篇,附见47人,并为当时尚健在的两位比丘尼立传。是书内容丰富,收录了大量高

德尼僧的事迹、寺刹名胜轶闻和尼众创作的诗词多首,文笔雄健简洁,事迹可靠有据,是研究中国佛教史、文化史、妇女史、文学史的重要资料。而其撰写,遭逢磨难,备历辛勤;经三年工作,书稿于1932年垂成,不意遇日寇犯沪,书稿在战乱中遗失,“前功尽弃,徒劳剔抉之勤,兵火无情,善缘多阻”(《续比丘尼传序》),其痛惜之情,可以想见。震华法师决心从头做起,他四处发信,借阅、搜集资料,又历时七年,终于再成全稿,于1942年刊刻问世。

震华法师最早出版的《僧伽护国史》(1934年),则是针对僧界隐遁山林、不问世事的风习,提倡僧人爱国参政,改变世人认僧尼“消极避世”的陈见。这本长达120余页的史论,解答了关于僧伽是否应该护国、是否真的护国等疑问,认为“僧伽为国民一分子,既受国家的保护,对于爱护国家的义务,自亦不能例外。”书中以经律所载佛陀热爱祖国,关心政治的言传身教为榜样,以教史僧传所载大量史实,说明爱国护国乃僧伽一贯的优良传统。历代僧伽表现出的护国行动,有积极的、消极的、急进的、稳健的、理论的、实践的、间接的种种不同,或革君的,或参政权,或捐款募军,或剿匪杀敌,表现出仁、智、义、勇、忠、直之精神品格,本之于菩萨道慈悲利生、报答四恩的理念。即弘宗演教,讲经说法,教化人们自净其意,向善向上,也起着安定社会、庄严国土的现实作用,又何尝不是护国?就此而言,历代高僧传,应当作僧伽护国史来读。

在《历史上僧人参政之光辉》一文中,震华法师系统论述了佛教、僧伽与国家、政治的关系,阐明佛教虽然超越政治,超脱于权位荣利之外,而关注政治,有自家的政治思想;佛教的教化可以补





助政治不及边远、易涉烦苛、不免贪污、疏于感化、时常变更等缺陷，能深入人心，无远不逮，“不倡乱而止乱，不滋事而息事”；古来佛门大德，有帮助生产、开发交通、利济行旅、翊赞教育、解除疾病、贍恤灾荒等政治上急切待举之业绩。他主张“僧徒站在国民立场，注意本身之民事，自属应有权益”；爱国不分界限，出家学佛亦可爱国；为政不必居官，出家学佛亦可为政”。号召僧人爱国参政，“绝不能以方自外，更不能以国自外，而忘其身为轩辕氏之苗裔也！”此文发表于抗战期间，有号召佛教徒爱国救国、投于抗战的用意。

抗战期间，震华法师还撰写了《入华求法高僧传》、《东渡弘法高僧传》二书。前者搜集日本历代入华求法的高僧传记，编为一册，后者是中国历代赴东瀛弘法的高僧传记。此二书的用意非常明显；提醒中日两国人民特别是提醒日本人民、日本广大佛教徒，重温中日两国悠久的友好交流史，铭记中国佛教对日本文化的哺乳之恩，以友情泯灭杀心，止息侵

略暴行，可惜二书当时未能印行。

震华法师的另一大作《清代佛教年鉴》，也是具有现实意义、具开拓性的作品。清代是中国佛教衰落期，清代佛教与近现代佛教关系最为直接。清代佛教的沉痾，乃近现代佛教振兴的大障，研究、总结佛教在清代衰迈的原因和清代佛教的种种弊病，对革除佛教积弊，促进佛教知识近现代社会而实现转型，具有极为重大的意义。《年鉴》按年代缕列出清代佛教的历程，为近现代佛教革新提供了一面镜子。

从震华法师的业行和著述看，他是一位思想先进、赤心热肠，才华横溢的现代新型高僧，他的身上散发出一种人间佛教的积极进取精神，而他在生活方面仍然保持传统僧伽的衲子本色，身居十里洋场而一尘不染，粗衣淡饭，俭朴自奉。“正企佛氏为金栋，忽向莲邦重玉旌。”（守培法师悼震华法师诗）“法弱魔强已固然，有才无命倍堪怜！”（濮一乘悼震华法师诗）纪念震华法师，我们对他的勤奋、热心、才艺和辉煌业绩，不能不由衷敬仰，对他的英年早逝，不能不再三惋惜悲叹！

在佛教史研究方面，震华法师为后人树立了一个典范，留下了一种珍贵的启迪。佛教史尤其是中国佛教史研究，在今日的学术界虽然有了长足的进展，但与佛教和社会的需要相比，仍显落后，海峡两岸的学界教界，至今尚拿不出一部篇幅适中、内容丰富、持论公允、有思想深度，可作为佛学院校教科书的《中国佛教史》；太虚大师、震华法师等所关注的佛教积弊的反省批判，在今日仍显必要，然并无多少人投入；为研究而研究者多，从佛教现实需要出发而研究者太少。佛教界对中国佛教史的研究尤显薄弱，何云所著“应当重视对中国佛教史的研究”一文（见《法音》1999年第7期页33）理当受到重视。培养出一批象震华法师那样从现实需要出发，以人间佛教思想为指导研究佛教史的僧俗学者，是新世纪对中国佛教的呼唤。